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教研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四

秦汉士史

于迎春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士史 / 于迎春著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
ISBN 7-301-04751-7

I . 秦 … II . 于 … III . 士大夫 - 历史 - 秦汉时代
IV . K23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2102 号

书 名：秦汉士史

著作责任者：于迎春

责任编辑：高秀芹

标准书号：ISBN 7-301-04751-7/K·289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9.5 印张 506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引　　言

对于秦汉及秦汉以后的士人来说，“士”这个新型阶层在先秦的兴起和作为可谓神话式的。然而，尽管“士”是从旧社会秩序的崩溃中兴起的，但它的出现，初看之下，似乎并不是为了新的政治体系，秦及汉初，新政权与声名显赫的这个阶层并不两相凑泊。士人们曾经在战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激奋昂扬，并殚思竭虑地提出了许多理论，以达成理想的社会救治目标，然而，就秦汉新兴的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来说，它似乎不愿，也不能够接纳这些在制度之外游徙、游离的知识者；同时，相当数量的士人对政权抱持了观望的态度，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置于与政权对立的立场上，他们好像更愿意回到那消亡了的体制中去。秦朝统治者与士人的尖锐冲突，便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背景。

不过很快的，历史就展示了它更加深潜的走向。士人在努力找寻和争取自己的社会位置，统治者也发现，舍士人而外，别无其它适合担任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社会群体可指望了。通过汉武帝开始的察举制、独尊儒术及其相关措施，以知识、道德为基本素养、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抱负的士人，获得了参与社会政治管理的有效资格，并由此而被社会所吸纳。以政治为核心，推及于经济乃至家族等方面，先前以个体的“游士”状态存在着的“士”，不仅获得了越来越稳固、切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从观念和实践上被嵌入错综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演变为士大夫，并趋向于士族化。这股原先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的力量，在汉代终于作为一个重要单元被逐步组合于社会结构之中，固着在一个基本确定的关系位置上。

“士”在汉代的士大夫化，相当程度上就是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随着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做官途径，参与意识形态建设，成为合法的政治管理人选，士人在出路、思想、学养上也逐渐官方化、规范化了。在秦汉以来士人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互动中，经过一系列调适，事实上，证明没有比他们双方更为彼此需要、更能相互满足的了。“士”是一个无组织的社会群体，士人的身份缺乏鲜明、固定的外在标志，国家行政官员、知识和道德的教育者、文化的创造者，这些角色不仅分别，而且往往同时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另一方面，“士大夫”一词意味着，被体制化了的士人显现出相较清晰、统一的整体面貌，国家行政官僚几乎就是他们的组织形式；以学识、道德为人生之本的士，与社会政治有着难分难解的密切关联，换言之，士人复合的角色状况乃是以政治为重心，对社会政治的态度如何和与之的距离远近决定着他的人生大概。

在倡导“四民”各司其职，重视相互依赖、合作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士”没有如其他文明中的一些知识集团一样，发展起独立的政治、宗教组织及等级制度，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对抗和分立并不十分强烈，虽然他们与农民、统治贵族明显不同，但又天然地来往于其间或者与之存在着自然的交流。由于士的流动性，其阶层的边界限域、范围极其模糊，无疑会造成其在结构和价值上一定的社会包容性。虽然如此，士人在社会中所享有的巨大的优越感却并不因此而被冲淡，作为政治、教育、文化三位一体的精英，他们是社会中独一无二的精神贵族。大致说来，士身份不具有政治、经济上的可继承性，作为精神贵族，与其说他们依靠出身与财富，不如说他们拥有人文性的优越，比如对智慧的追求、对古典语言和经典的熟稔、对文化的独占等。

“士”在被体制化的同时，又有他们特有的难以被体制化的东西。在社会实际事务中担任具体管理的同时，士人又是较高的价值生活者，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任何其他阶层像士一样具有那样

崇高、系统、自觉的价值标榜。春秋战国以来，士人在发展新知识的同时，也重建了系统，重塑了先圣前贤，使较为原始的、仪式化的、神圣的知识，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感性生活经验的剪裁，重新成为他们结撰新知识的材料。春秋晚期以来，一直到汉初，可以看做是士在理论和价值上的建设阶段，有关士的理论上的搞定十分突出，比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对士的人生理想和行为原则的发布，都力求为士阶层本身设计价值；《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对“士节”的规定和重申，也意味着为士寻求价值地位的努力。

秦汉时代，“士”的那些基本是在未被体制化之前奠定的、主要以理论状态存在着的价值，在与社会的碰撞中不断进行调整。这一时期，与对社会政治的参与大致同步，士明显地以实行而非价值理论的建设见长。随着君主大致肯定士的价值并藉以选用、勉励士，士价值也必定在某些层面上官方化、政策化了。价值理论与现实存在的矛盾关系越来越为人感同身受，当士人不得不把进入行政官僚队伍作为寻求衣食和荣誉的要道通途时，他们的工具化就成为势在必然的了，其通于世务、娴习政事，则往往以对东周及汉初儒士理想主义的逐渐放弃为代价。汉代士人所定义的，无论是“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还是“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后汉书·仲长统传》），比起孔孟先贤所倡导的“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实用的入世倾向。从高远的理想落向了有缺陷的实行，毫无疑问，这既是士人从价值的理论建立走向现实的体行、进入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必然，同时也未必不与他们自身资源的局限和窘迫有关。

日益扩大的士阶层在对人生失意和退守的坦然接受中走向成熟，他们逐步拓展、丰富其阶层文化，建立起他们所特有的活动领域和较为全面、弹性的人生方式。从自我高尚到认识到个体力量的脆弱和渺小，深知了命运的强大的这个社会阶层，不得不学会面对失败、化解不如意。强烈的功名之志和单一的生活取向，曾经使

得汉初的士人在遭遇仕事挫折之后，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西汉后期以来，士人们引入了看待社会政治参与的另外的角度和眼光，尝试着发展起具有退守功能的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念和行为体系，它们既是策略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正视仕途之外的生活天地，并设法开辟、经营它，如此发展起的与“公”相对的“私”的生活，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和内容，即是说，使得退隐不仕的生活也具有相当的自觉性。对于看重意义的士人来说，他们试图使哪怕是闲暇的生活，也带有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在从春秋晚期开始的“士”的漫长的演变历史中，秦汉只是其早期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几百年对于“士”长期以来的存在状态和人生格局的确立，乃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士人们已在现实中演出了多少悲剧和喜剧，也无论他们有多深的无奈和叹息，命运还都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他们的存在本身所内在固有的矛盾：文化价值的绝对性与现实存在的相对性之间的不协调，价值生活者与社会事务管理者身份的混合，精神上的高度优越与结构、组织上的模糊不清，以及体制、出路上的单调和依赖性的同时并存。对于这个社会中最具有精神优越之感，又需要以自己的智慧来向国家或有势力者换取生活资料的“士”而言，缺乏足以反对皇帝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基础和资源，乃是构成了传统社会合作与稳定的条件之一。

是在以上对秦汉士阶层演变大势理解的基础上，我开始描述这一历史过程中士人的行为和情感，他们所发生的内心的调整、人生的矛盾、价值的变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责任编辑 高秀芹

封面设计 张志明

国学研究丛刊已出版著作目录

中国文学简史	林 庚	著
汉唐史论稿	汪 篁	著
来之文录	季镇淮	著
《孙子》古本研究	李 零	著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王小甫	著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一分册	李锦绣	著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	李锦绣	著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三分册	李锦绣	著
三国演义丛考	周兆新	主编
清一条鞭法	袁良义	著
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	著
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	王锦贵	著
中国兵学文化	张文儒	著
来之文录续编	季镇淮	著
文选版本研究	傅 刚	著
秦汉土史	于迎春	著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秦朝的建立及与士人的尖锐冲突	(1)
一 统一事业使秦国逐渐成为事功之士的重要选择.....	(1)
二 士人在秦朝的不适感.....	(7)
三 士人与专制政权的激烈冲突及“焚书坑儒”	(13)
四 对“焚书坑儒”的舆论夸大	(23)
五 士与秦朝矛盾的复杂性	(28)
第二章 汉初社会由武向文的转化及诸侯	
—游士时代的真正结束	(33)
一 汉初游士风盛及统治集团的普遍质木少文	(33)
二 儒士对汉初社会政治的参与以及对君主用士的呼求	(41)
三 游士风尚的渐趋式微	(50)
四 对诸侯势力的全面抑夺	(55)
第三章 士人文化思想在儒学基础上渐趋一统	(61)
一 汉初黄老政治流行及儒学思想的抬头	(61)
二 武帝对社会政治的新开启及儒学地位的上升	(69)
三 “儒术独尊”格局的确立	(75)
四 儒学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磨合	(80)

第四章 选举制度的建立及士为社会政治所容纳与吸收	(87)
一 西汉前期士人入仕门径的纷杂不一	(87)
二 武帝使士人的仕进趋于规范化以及士与君关系的一些变化	(93)
三 公卿大臣之养士与进士	(100)
四 士人功名追求的现实性	(106)
五 士与国家进一步结合及经明行修的士大夫标准的确立	(111)
第五章 西汉后期社会的儒学化	(119)
一 士人的学仕结合	(119)
二 儒士的生活境遇及其精神价值	(126)
三 儒学广泛的社会传播	(132)
四 社会政治的士大夫化趋势	(139)
五 以阴阳灾异学说为特色的社会政治批判	(146)
六 儒术独尊意识的社会发展	(156)
七 经术之士与事功之士的价值冲突	(160)
八 儒、法相兼及以儒术为核心的思想整合	(171)
第六章 士人在专制政治中所感受的压力及其作为出路的处世哲学	(180)
一 专制政治的巩固及由此而来的对士人的约束	(180)
二 士大夫的政治艰危	(188)
三 在君本臣末的关系基础上皇帝与士大夫矛盾的必然性	(200)

四	基于仕途失意的对屈原的新理解	(206)
五	东方朔富于开启性的时代批判及朝隐的 处世哲学	(214)
六	扬雄的时势批判及其处世哲学和人生矛盾	(224)
七	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的渐次流行	(235)

第七章 王莽与士大夫的关系及西汉

	末年的士风	(247)
一	西汉末年的社会衰乱	(247)
二	士大夫的政治表现	(251)
三	士大夫与权臣的关系以及王莽的崛起	(255)
四	王莽与士的关系	(262)
五	西汉晚期的清行高节之士	(270)
六	士阶层的扩大及其社会交往的发展	(277)

第八章 东汉社会进一步经术化及士人

	经行上的观念和实践	(284)
一	刘秀及其功臣集团与汉初迥然不同的 经学面貌	(284)
二	东汉前期政治上层的充分经术化及学术活动	(288)
三	社会经术化的深广程度	(296)
四	学习观念和实践的益趋世俗化	(305)
五	士大夫自我拘敛的道德实践	(314)
六	“孝”上升为士人百行之首	(321)
七	士的其他主要社会人际关系及伦理	(328)
八	经术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越来越不容乐观	(338)
九	“道胜于事”的文化意识及士阶层内部的	

进一步融通.....	(342)
十 图谶的兴盛及其与正统儒士的文化冲突.....	(353)
 第九章 东汉士大夫的政治处境和体验及其与社会政治势力的关系 (364)	
一 东汉初期的严刻吏治及士人入仕之途的日益拓宽.....	(364)
二 对士人的荐拔和礼遇.....	(373)
三 士人与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关系及士为国用的进一步明确.....	(378)
四 士人的功名期待及为官任职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387)
五 士人的政治被动性和对大一统专制政治的进一步适应.....	(390)
六 德才之士的仕途困顿感以及对谗嫉的批判.....	(399)
七 因仕事挫折而来的时命感伤.....	(407)
八 士大夫对君臣和谐关系的憧憬及在现实的尊卑中对道义原则的持守.....	(412)
 第十章 东汉后期的政治衰坏与士大夫的推助和挽救 (418)	
一 士大夫对社会颓风败习的顺应和参与.....	(418)
二 选官任职的虚滥不实和向社会人际关系的倾斜.....	(427)
三 宗族力量的不断发展及士与宗族的结合.....	(435)
四 世家大族对士人的影响.....	(440)
五 朝廷的卖官鬻爵及商贾势力对社会政治的	

侵入.....	(444)
六 在时势的衰乱中士大夫的政治抗争和顺从.....	(451)
七 党锢之祸前的士大夫政治拯救.....	(458)

第十一章 以党锢之祸为表征的汉末士大夫

救世事业	(465)
一 士的社会轻视与排斥.....	(465)
二 士与宦官日益加剧的矛盾冲突.....	(468)
三 士大夫社会的以言论救世运动.....	(476)
四 党祸之前的士大夫救世悲剧.....	(482)
五 党锢之祸与士大夫的政治慷慨.....	(488)
六 党锢之祸与士林反响.....	(496)
七 士大夫与宦官斗争的误区和局限.....	(501)
八 士大夫救世护国活动的悲剧性终结.....	(507)

第十二章 东汉中后期的不仕、隐逸之风及

士人的人生安顿	(513)
一 东汉前期士人的隐逸不仕.....	(513)
二 儒术社会中的道家融渗以及退隐不仕的 趋于日常化.....	(517)
三 东汉后期不仕之士的有用与无用.....	(527)
四 冯衍:在人生的严迫中不得已向隐逸 出逃.....	(535)
五 张衡:内在实现的归隐梦想	(542)
六 蔡邕:在出处进退之间的难得其所	(548)
七 不仕者的达生任性与崇道好仙.....	(556)

第十三章 汉末士风的新变	(567)
一 士的游动性和交游风盛	(567)
二 交友之道和士友相结	(574)
三 当今人际交往的与古不同	(579)
四 建立在对人的深入认识基础上的人物 评议潮流	(585)
五 士风的浮华与时代的苦难	(598)
主要征引书目	(609)
后记	(612)

第一章 秦朝的建立及与士人的尖锐冲突

一 统一事业使秦国逐渐成为事功之士的重要选择

秦本为地处西陲的蕞尔小国，在国民的气质、风习和执政的意识及风格上，均与东方六国有很大的不同。一般地说，它对周代文化传统的体现和保持并不深厚、充分，也就相对较少为旧的道德规范所约束。这种不免为传统悠久的其他国度讥为粗浅鄙俗的文化异趣，却使得秦在宗周文明趋于崩溃之时，崭露其年轻、壮旺的生机。^① 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质实而野心勃勃的秦国在要求对整个天下的权利时，采取的是与其他诸侯国家大致类似的步骤、方式。当着“得士则强，失士则亡”成为国际间的律则时，有采择他国人材、任用客卿之美谈的秦国，不可避免地亦以对贤能之士的延揽

^①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韩非子·饰邪篇》）。此外，尽管东富西贫，但当时七国中，尤以秦之“马最精良，民最悍勇”。秦固不事学术、人文，却自有其战胜的基础（详参《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战国时代列国民风与生计》，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

为当务之急。^①洪迈《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曰：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秦王嬴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及吕不韦任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另一位有決事权力的势要人物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同上）。总之，在当时诸国纷纷礼贤延士的潮流中，秦之执政并不甘居人后，亦努力“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于他们说来，广招天下士既可获得富国强兵所需的有效的智能资源，同时也是显示国家声威、令天下信服的方式。秦王的重要卿相全属客籍，即使统一天下之后亦然。要之，时代风尚不独为山东诸国所煽炽。^②

如果说秦王，尤其是嬴政，与东方六国诸侯待士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士人的接受，更多地取决于功利性的政治

^① 先秦人文蔚盛的区域在河、淮间大平原中部和东部地区，秦本土的人才，在七国间相较为最少（详参《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然而，“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羖于宛市，取丕豹于晋卿，迎蹇叔于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继踵而至，故能世为强国，吞灭诸侯，奄有天下，兼称皇帝，由谋臣之助也”（《晋书·段灼传》）。黄留珠总结曰：“秦自惠文王十年（前328）由魏人张仪当国为相之后，形成了以客出仕的高潮。”这高潮具体表现为，秦高级官员的选拔，多“出于客”；以客出仕发展为以客卿制度为表征的规范化形态。要之，以客出仕变为“秦仕进的显途、要途。”（黄氏《秦汉仕进制度》第40—4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秦公子亦颇染于此风习。嬴政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胡亥也被称作“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讷于口，尽礼敬士”（《史记·李斯列传》）。

需要。^① 他对士人基本不表示趋从性的关注和兴趣，高筑黄金台的盛意和卑事下体的殷勤，在他看来都不过是矫揉的表演、夸张的仪式——他不打算作什么姿态，以在普天之下树立起礼贤下士的时代英雄形象。换言之，招士本身不是目的，他图谋的，乃是对于整个天下的权利。^②

因此，尽管游士者众，秦王与士人之间却难得建立起令人动情、感念的非政治化关系。士虽得任用，但嬴政始终严格坚持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不仅不肯以对现实政治的些微牺牲来博取士众的好感，甚至还对他们心有疑忌，深持戒备。^③ 这些不辞辛苦奔波游走于天下的士人，他们的动机、目的，对秦王政来说既易解，又不免生疑。一方面，“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商君书·农战》）；另一方面，“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史记·李斯列传》）。一旦有风吹草动，他的怀疑士人有可能威胁其国家政权的意识，便不由分说地强化起来。还在统一天下大业告成之前，嬴政便“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同上），这种决绝于四方之士的大规模举动，再清楚不过地透露了他对士人并无

① 《战国策·秦策》载，魏人姚贾出身微贱，行品不端，游说赵而见逐。秦王欲不用，姚贾以史事谏说之，曰：“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据说，秦王政乃委之以重任。

② 嬴政不是没有下士的举动。大梁人尉缭曾因献计而得秦王的礼遇：见之亢礼，衣服饮食与之同。然而尉缭从中感受的，不是心满意足的自得，相反，秦王这种与其素性、为人颇有出入的一反常态，令前者紧张不安。尉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摶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游士自然有可为人警惕之处。齐之宾客因受秦赂遗，而为反间，劝齐王去从朝秦，以致齐人怨之，疾王子建用客之不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以说，宾客、游士对君主的影响，既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常常不免是破坏性的，甚至于别有用心。